

雪山草地长征路



1936年7月,红二、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,分成左、中、右3个纵队北上。中纵队由阿坝壤塘翻山到阿坝安坝,途经夺沟、沙湾等地时,藏族群众因受土官头人的欺蒙宣传,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,几乎都进了山林躲避。红军走后,阿坝县柯河区垮沙乡沙湾村村民索朗、仲加和桑加在返途中遇到一名身负重伤、气息奄奄的女红军,身边还带着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。当她看见索朗他们时,竭力用颤抖的声音说着什么,手上还不停比划着。索朗等人虽不懂汉语,不过从女红军的表情仍猜出她的大意是:“我的病很重,求求你们救下我的孩子。”当索朗他们会意地把小孩抱到手里并向她频频点头时,这位女红军才终于放下心来,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们迅速就地掩埋好这位女红军,把孩子带到夺沟村民共特家里隐藏起来。

过了几天,村里不少人听说共特家有红军娃娃,都想亲眼看一看。当大家看到失去父母的红军娃娃时,无不心生怜悯道:“呀依娘结,呀依娘结”(小孩可怜的意思),并纷纷伸出救援之手,你一碗糌粑,我一坨酥油,把粮食和一些茶、盐、衣物等送到共特家,用以抚养红军娃娃。从这以后,共特抚养红军娃娃的事,便在远近乡邻间传开。面对此情,索朗心想:如果被土官(当地部落的最高统领)知道共特家藏有红军娃娃,不仅会被割舌、抽筋,而且红军娃的命也保不住。于是索朗就把红军娃娃从夺沟接到沙湾,当自己的儿子抚养起来。

然而消息最终还是走漏了。一些土官在沙湾村穷凶极恶地叫嚷:“索朗家藏得有红军娃娃,如果不早点交出来,那就要重重惩处。”后因索朗八方托人说情,给土官送了厚礼,红军遗孤才幸免于难。就这样,这位红军遗孤落脚沙湾村。

在沙湾村,没有姓名的红军娃娃不仅得到了索朗

牧民抚养红军娃



图片由AI根据文章内容生成

的精心照料,而且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。为把他抚养成人,贫困的牧民们匀出一碗又一碗的糌粑、奶茶,共同养育他,并亲切地唤他“一碗子”。渐渐地,这个牧民们的习惯称呼就成了这位红军遗孤的正式姓名。

在牧民们的悉心帮助下,“一碗子”健康快乐地长大了。长大后的“一碗子”,凭借着勤劳善良和质朴真诚,娶了一位善良美丽的藏族姑娘色尔姐为妻。两人婚后生活美满幸福,一起放牧,一起劳作,同时照顾年迈的索朗。

直到阿坝解放后,当地藏族乡亲才将这秘密公

布。知道自己身世的“一碗子”既为有着红军战士的血脉而感到无比自豪,又对养育自己的藏族乡亲充满了深深的感激,是这片草原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,是这些淳朴善良的藏族乡亲们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凭借着对草原的熟悉和多年的放牧经验,带领乡亲们发展畜牧业。在他的带动下,当地畜牧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,牲畜的数量越来越多,质量也越来越好。“一碗子”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感恩与担当。

(来源:州委党史研究室)

艺苑访谈

■万梓颜

三、拾遗

程峰先生出生在成都,不久就随父母去重庆再迁居五通桥,一住就是三十多年,直到1985年才回成都。在《水韵墨律五通桥》这本画册里收录了近一百幅水墨小品,都是他自2012年以来在五通桥写生的。他抱着“五通桥这些田园、古镇,需要抢救性记录”的念头,一次次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,用笔墨里和往日的岁月对话。这些作品借鉴了西画的透视、光影,风格偏写实。先生说:“有一次,我把画好的医圣祠给居民看,他们一眼就认出自己小时候住的地方。”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郑晓丰在为他的画集作序时,把他的系列创作定义为“为四川古镇立传,给大美四川立传”。

先生的古镇写生,远不只是美术创作。在蔡金镇画石碛寺时,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告诉他三件事——著名画家李琼久的出生地,离这儿四公里;曾任省佛协副会长的得道高僧遍能的出生地,离这儿七公里;不远处还有一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的坟墓。他把这三件事全部题写在画上,一幅风景画,就这么成了一部地方志。他还画过许多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地方。有一次他在五通桥牛华溪对着一个“破烂的门洞”(原四川盐务知事总署现为垃圾站)写生,旁边路过的人都觉得他在“发神经”,结果画完不久,那个门洞就被拆了。“我画它的时候,它还在。画完了,它就永远在了。”他画杨家祠堂,“那里是当地大户,出了不少人”;画多宝寺,“那是南怀瑾当年闭关的地方”;画五通桥,不只画风景,更要画出它因盐业而兴的辉煌:“战时工业重镇,李劫人在这儿办过厂,是四川最早用电灯的地方之一”。他甚至能从徐悲鸿三次到五通桥并将此地誉为东方的威尼斯,讲到漫画家方成——武汉大学毕业曾在五通桥永利川厂就职,1948年回上海,1950年到人民日报工作……把地方文脉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。

近十多年来,程峰先生坚持以水墨的形式在巴蜀地域中对古镇民居进行写生创作。其山水画作品《万年寺圣景》曾获“2009年全国山水画学术邀请展”金奖。2022年“首届巴蜀文化论坛”在成都召开,作为北京、重庆、成都三地15位主旨发言者之一,程峰先生以《古镇写生与文化传承》为题作了发言。“四川省文联古镇题材文艺创作规划课题”《水韵墨律——程峰写生画集》已出版9部,涉及三百多个古镇、两千多幅作品,涵盖五通桥、理县、合江、安仁、洪雅、天全、仁寿、峨眉山、眉山等地,另外还有《水韵天成·墨韵物化》《程峰速写》《乐水乐山》等共15辑。这次采访,我有幸得到了其中

水墨从心 丹青拾遗(下)
——程峰先生的艺术之路与人文守望

程峰作品“开满杜鹃花的峨眉山”

四本,真是爱不释手。

翻看着这些珍贵的画册,我有些意动,先生的画,若当作“画”来看,我未必说得清笔法意境的高明之处;但若当作“文章”来读,我便懂了。他不仅是在画风景,也是在写方志、续传承。每一幅画都是一个短篇纪实历史小说,有背景,有人物,有命运……这或许就是文学与绘画最深层的通感。在同代艺术家中,用笔墨记录乡土存亡的并非没有。但先生令我敬服之处在于:他以艺术之眼辨识,以史家之智串联,以赤子之心记录,几十年如一日,让许多画作都成为连接自然、造物与人文的“文献性”珍本。他也为“传统中国画如何介入当代现实”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指向。

四、师道

后来我们的话题就比较散漫,当说到我们都非常感兴趣的非遗文化,先生的话匣子就打开了,他回忆起多年前一些艺术家在做非遗项目时,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,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艺术,却“把控不好”非遗本身的标准。“评判非遗必须用非遗的尺度,而不是个人创作的尺度。”我问,“这样的情况多吗?”他苦笑了一下,又给我举了好些例子,随后又说:“还有一些院校,把传统专业换块牌子就成了‘非遗专业’。这叫什么?这叫换脸皮。”说的语气并不激烈,略带着调侃。但那调侃底下,我听得出一丝无奈的锋利。他说这是用简单的方法应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复杂性。离开了生态的情境,任何展示都容易把文化的本真剥离和异化。”那一刻,我们都沉默了。我又问:“您对非遗的事如此‘操心’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”“2003年。”他说,

阿郎小说一瞥



图片由AI根据文章内容生成

■白林

2026年开年,阿郎为读者倾情奉献出了短篇小说《寄魂山》(发表于《雨花》2026年一期)和中篇小说《空谷落英》(发表于《中国作家》2026年一期)两部(篇)小说。

长期以来,我州的文学创作以诗歌见长,小说创作一直是短板。因此,对包括阿郎在内的作家小说创作动态的关注与研究,对进一步助推阿坝作家小说创作的繁荣与进步,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

拜读完阿郎的短篇小说《寄魂山》和中篇小说《空谷落英》,我得出一个初步印象:阿郎的小说创作已步入深耕期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是文学创作的至理;而能否长期安静地深耕,我以为则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致。

在阅读过程中,我特别注意到阿郎把握细节的能力与功夫。在《寄魂山》中,阿郎从藏族民俗的一个细节入手——爷爷突然开口说话,道出自己的灵魂寄放在莲宝叶则神山的一棵老柏树上。围绕这个细节,阿郎精心构思,采用一明一暗的双线结构,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而在《空谷落英》中,阿郎以大家熟知的“金川阿寇”这一历史故事为底本,在详尽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,融入边地土司、爱情、战争、美人计等元素,虚构出一部三万余字的中篇佳作。

一部小说是否成立,关键在于其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能否立住。若人物形象站立得住,小说便成功了大半。阿郎深谙此理,始终以自己熟悉的生活、熟悉的民族、熟悉的情感,作为小说创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。

这让我不禁想起多年以前,与一位藏族朋友的交谈,他说不愿藏族人是跳不好锅庄的。我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和意思,也就用在阅读阿郎这两部(篇)小说中。

小说属于虚构文学的范畴。显然,在阿郎笔下的莲宝叶则、大小金川、碉楼、东女国等意象,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折射,甚至,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,由此可见,阿郎对脚下这片大地爱之深切。因为爱是一切情感的源泉,没有经过爱的过滤、经过提炼与内化的表达,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注定是不会形象而生动的。

若非要划个比例,我觉得一半一半吧。在阿郎的小说中,源自生活的积累与观察占一半,来自虚构的人物与刻画占另一半。因为在小说创作中,细节是无法虚构的——比如一张狼毒草制作的绘画纸,比如大小金川的碉楼、青稞酒和酥油茶,这些高原寻常可见的生活与烟火记忆,无法凭空捏造。而小说中人物的衣着、外貌、动作和对话等则属于可虚构的范畴,正如鲁迅先生在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中所言:“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,没有专用过一个人,往往嘴在浙江,脸在北京,衣服在山西,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。”

尽管在AI时代,有人预言人工智能在未来终究会取代文学创作。即便如此,我仍然坚信:人类的情感和虚构才能,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。这也是虚构文学在如今弥足珍贵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吧,因为它是对人的创造力的鼓励与肯定。

在藏族文化中,“寄魂山”是指英雄或神灵灵魂寄托之地的神山,比如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中格萨尔王的寄魂山就是阿尼玛卿雪山。阿郎的短篇小说《寄魂山》故事围绕少年道尔吉展开,他踏上了前往莲宝叶则神山的旅程。

再来看《空谷落英》,乾隆皇帝打金川以及关于“金川妖姬”阿寇的传说,一直是众说纷纭。阿郎也并非第一个创作这个题材的作者,可谓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能否不落窠臼写出新意,显然是阿郎在该部中篇小说中要解决的难题。况且,中篇小说创作的难度,就在于尺度的把握,即如何写,写到什么程度。显然,围绕阿寇这个历史人物,站在不同的立场,所表达的角度与倾向也就不同,在土司与皇帝的对话中,主要是以两种方式:一为羁縻与朝贡,二为刀剑与血火。

这两部小说的语言,依然保持了阿郎简洁干练的风格。在叙事中,阿郎删繁就简,不在场景描写与铺垫上花费过多笔墨,而是直指人物内心,注重人物刻画的层次感与立体感,同时情感节制,不做过度渲染,这些都是阿郎小说创作的优点与长处。在谋篇布局上,阿郎以小切口巧妙代入主题。比如《寄魂山》的开头,以草原上空云朵的变幻来联想人物的灵魂,构思巧妙新颖,令人耳目一新。再如《空谷落英》中,以云南人夫妻这类外来者的视角,灵活地布局了小说的空间结构。由此可以看出,阿郎已是我州一位娴熟掌握小说创作技巧的重要作家。

至于说到这两部小说创作中的不足,首先需要明确的是,那是一个作家在成长进步过程中的不足,而非其他。若凭个人欣赏的喜好,我更偏爱《寄魂山》,这是一篇很棒的短篇小说。

至于中篇小说《空谷落英》,若小说语言(尤其是人物刻画方面)的密度再强化一些,人物对话的层次感再丰富一些,表现手法再多一些变化,或许艺术感染力会更上一层楼。然而,瑕不掩瑜,这两部作品,依然是2026年度值得推荐的小说佳作。